

# 浅析经元善的慈善思想与实践\*

屈小伟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经元善是 19 世纪下半叶江浙绅商的领袖人物, 更是一位知名的慈善活动家。本文首先探索了经元善举办慈善事业的根源, 接着论述了其慈善思想与实践的发展历程。其慈善思想和实践的前后转变体现了当时社会慈善义举发展演变的一种新趋向, 并对社会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关键词] 经元善; 慈善; 原因; 发展; 影响

[中图分类号] K25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5823(2009)04-0010-05

经元善(1841—1903)是清末著名的企业家、教育家, 也是一位影响遍及全国的慈善家。“身处千古未有之大变局的晚清时代, 他以绅商的财力, 以慈善家的懿德, 以宗教般的虔诚, 投身于社会慈善公益事业长达三十余年之久。”<sup>[1]</sup>

## 一、经元善慈善思想产生的原因

经元善于 19 世纪下半叶成为江浙绅商的领袖人物, 此后, 他逐渐将精力从商业活动转移到慈善事业。出现这一转变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除了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之外, 还与当时出现的民族危机和现实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 儒、佛、道等传统文化都对经元善慈善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儒家文化中的慈善思想是以“仁爱”为中心, 包括大同思想和民本思想在内的慈善思想体系。佛教除了提出善恶观念, 还提出了因缘业报说。道家带有祸福皆由天定的宿命论色彩, 善人得福。基于此, 经元善要人们多做善事, 劝有钱之人将多余的钱捐助给需要救济帮助的人。这对于义赈的宣传是极具诱惑力的, 又造成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对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 经元善为了更好地开办义赈, 毅然选择停歇祖传的仁元钱庄, 重义轻利, 不计功名利禄, 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开展救困扶危的慈善事业。

## (二) 社会现实的影响

中国历来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到了

近代, 内忧外患的处境和永无宁日的兵燹匪患, 使各地灾害更加严重, 人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就为经元善从事慈善事业提供了客观基础。此外, 处长江三角洲的上海, “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 活跃的市场环境和开放的社会政治氛围”<sup>[2]</sup>, 逐渐成为新的商业中心。加上“江南是民间慈善活动较为兴盛的地区, 素有行善劝善的风气”<sup>[1]</sup>, 在天灾人祸发生时, 大批难民纷纷涌向上海, 这就为经元善等人提供了施善助贫的对象。加上“随着鸦片战争后洋教的深入, 一些传教士或教会在通商口岸及内地兴办了育婴堂、孤儿院、诊所、医院等育婴与医疗慈善机构”<sup>[3] 215</sup>或许正是受外国人办慈善的刺激, 许多中国人开始从事慈善事业, 并以西方慈善事业为镜, 吸其精华, 去其糟粕, 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的改良与发展, 以达到振弊起衰的目的。经元善等人正是怀着救人济世的抱负, 以博施济众的态度开始筹资办赈, 募款救灾, 以减轻广大灾民的流离之苦。

## (三) 家庭环境的影响

其父经芳洲十分热心善举, “见义勇为, 乐善不倦, 生平精力毕卒于此”<sup>[4] 169</sup>经元善深受家庭熏陶, 其父去世时, 仅给儿孙留下屋基地, 其余田产全部拨给义塾, 且叮嘱他“乡邑井里间凡遇善举, 勿尽我心力”<sup>[4] 170</sup>经元善常常对其父亲感念不已, 时时铭记其教诲, 笃行善行, 将其父始创的许多慈善事业不断改进扩大, 并且“为之十余年, 风动四方”<sup>[4] 395</sup>

\* [收稿日期] 2009-07-01

[作者简介] 屈小伟(1985—), 女, 土家族, 湖南张家界人,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 二、经元善慈善思想与实践的阶段性发展

经元善的慈善观发端较早,以甲午战争为界可分为两个时期。

### (一)甲午战争前经元善的慈善思想与活动

1866年,经元善接任上海同仁辅元堂董事之职。他悉心筹划,广为劝募,竭力办好恤嫠赡老,施医给药等各项善举。这一时期经元善的慈善观念沿袭了传统乐善好施的善恶报应观,甚至残留着迷信色彩。宣传义赈时,他用善恶报应、好善乐施的观念劝说绅商捐资救灾。他创建经氏宗祠并对族内成员加以救济,但这并非纯粹的济贫,而是为了维持家族声望。这些都体现了他早期慈善思想的狭隘性。与此同时经元善的慈善观念也出现新的发展,突出表现为新式义赈的开创。从1876年起中国北方发生了严重的旱灾,经元善自1877年冬开始从事较大规模的义赈活动,发起募捐救济灾民。这是他慈善思想形成的一个起点,也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虽李金镛和胡光墉等已首创了义赈,但将之发扬光大,使之成为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义赈”活动的则是经元善。由其开创的新式义赈与以前的民间赈灾活动有所不同,呈现出一些新的内容和特点。

第一,规模空前扩大。首先,从募捐的范围来看,传统慈善组织募捐的范围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而经元善1878年在上海成立了“协赈公所”,以此作为上海绅商进行义赈活动的常务机构。“不久,苏州、扬州、镇江、杭州的筹赈公所也相继成立,并均以上海协赈公所作为中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sup>[4]</sup>后来,随着经元善加入洋务企业,义赈活动的募捐范围进一步推广发展。就社会身份来说,经募输捐之人,上至达宦名流,富绅巨贾,下至仆隶乞儿,村野编户,就连远隔重洋的爱国华侨也“向风慕义,踊跃输将,献出一片赤子之心。”<sup>[5]</sup>这种“善固不择人而为与,亦不择地而出”<sup>[6]</sup>的捐赈义举,突破了宗法乡土观念的束缚,形成了规模空前的义赈活动。其次,从赈济对象来看,以往的各项慈善事业都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而经元善所领导的义赈不同,它从一开始就是跨越省区的行动,并不断向外扩展。“上海公济同人会”赈济的对象和范围“由最初离沪较近,又有乡贯情谊的苏北,而至无亲无故的山东,再至河南、山西、陕西及直隶等地,早已跨越了地区的界限。”<sup>[3]</sup><sup>239</sup>由此可见,此时的义赈已经破除了狭隘的畛域观念,不论灾区,只

论灾情,惟灾是趋。

第二,模式与方法的规范化。在此之前,赈灾只是个别绅商的临时性私人慈善活动。而经元善领导的义赈活动则已成为包括大多数江浙绅商在内的社会公益活动,并逐步形成了一套颇具规模的组织体系和比较科学的运作模式。义赈活动每开辟一个赈区,都要先派人去灾区做调查,再根据灾情来确定赈济范围和灾区人数,按发放标准拨给款项,并派人专程押解到赈区,然后在地方官吏的配合下按规定发放。这就明确规定募款、司账、押运、放赈四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各司其职,并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从而形成了募集捐资与实施救济相分离的体制。“这种募、收、运、放相分离,定点、定人、定款的赈灾方法,使贪污中饱之事难以发生”,<sup>[4]</sup>并有利于提高赈务的工作效率。此外,每月都要将赈款的用途和去向登报公诸于众。这样就杜绝了账目混乱和贪污挪用的现象,扩大了义赈的规模和影响。

第三,治河代赈的实施。政府对洪涝采取的措施一般都是灾后放赈,这是一种消极的救济方法。经元善通过长期的慈善救济工作,提出了治河代赈的主张,希望从根本上消除灾源。1880年,他亲赴灾区放赈长达两月。在此期间,他对直隶的灾情和原因作了实地考察和调查访问,认为造成水灾的原因在于“直隶之水,源派繁多,宣泄不畅,乃不事疏导,专事阻遏。”<sup>[4]</sup><sup>23</sup>那么要彻底解决直隶水患,就必须改变以往治标不治本的方法,“惟有广开新河,宣泄积涝,排决归路。堤则筑而永固,水虽大而易消,脉络贯通,害除则利自兴也。”<sup>[4]</sup><sup>25</sup>这种改放赈为治河的主张,得到了有识之士的认同,称赞这是一劳永逸之策。此外,治河代赈“既可弥补政府赈款之不足,又可使灾民得以趁工,而地方可籍免患,即减少不安定的因素,稳固地方的社会秩序。”<sup>[3]</sup><sup>309</sup>

### (二)经元善慈善思想在甲午战争后的发展

维新运动后,社会各界对慈善活动有了新认识,进而产生了近代意义上的社会慈善公益事业。此时,经元善的慈善思想已经跳出善恶报应观的窠臼,开始向近代社会公益思想转变。他“不仅在思想观念上就慈善公益与社会改造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认识,而且也积极开展了一系列新的社会公益活动。”<sup>[6]</sup>可以说,这是他慈善公益思想和活动的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突出表现在教养兼施理念的形

成。以往的慈善之举,大多是灾后的临时性募捐赈济。经元善觉得这固然必要,但却有不少弊端,故他提出了救急不如救贫的观点。此外,从管理善堂的经验中,他认识到善堂的惠泽有限,重养而轻教是这些传统慈善机构的共同弊端。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善举之惠,应从一身及至一家,从一时及至永久。这就要求改变传统慈善活动的内容与格局,教养并重,标本兼治,以期产生更广泛的社会效益。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经元善在甲午战争后的慈善活动也具有了新的内容。

第一,举办新式学堂,开展慈善教育。随着西方各种思潮传入中国,很多人认识到慈善事业要向近代化,就必须向西方学习,重视慈善教育。经元善对此深表赞同,并努力付出行动,大力兴办慈善教育。这一时期他所从事的慈善教育事业主要有:

创办经正书院。甲午战前,经元善曾在上海创办了“经正书院”。后因经费困难被并入南洋公学。1899年秋经元善决定重新开办经正书院。此时的经正书院,名虽由旧,实则更新。首先是招生对象不拘一格,以前书院主要招收富庶子弟,现在“尤拳拳于寒灯攻苦、有志无力之徒”,<sup>[4]284</sup>并且降低学费。其次是教学内容丰富,课程既有策论、掌故等,又有西文西学。再次是教学民主,坚持因材施教,学生管理也体现民主精神。经正书院的重新定位,反映了经元善教育为社会服务、适应时势需要的民主办学思想。

兴办女学。经元善认为“今日中国不振,归咎于二千年女学不开。”<sup>[4]182</sup>同时他还强调“女学堂之教人以善与赈济之分人以财可同日而论”,<sup>[4]213</sup>均属于善行义举,应推而广之。经元善兴办女学的思想得到了慈善界同仁的支持和响应。1897—1898年间,经元善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女学堂。这是他从事慈善教育事业的一个顶峰,同时也开创了国人自办新式女子教育的先河。《新闻报》等多种报刊杂志都称赞创设女子义学为最大之善举。虽然女学堂遭到朝臣的反对,但经元善毫不动摇。他试图通过兴办女学,造就有文化的新女性,从而改良传统的母教,以培养出“文明的种子”、“优胜的后代”,造就好“第二代国民”。<sup>[7]</sup>在它的影响下,苏州、松江及南洋等处,都陆续设立了女学堂,掀开了女子教育的新篇章。

创立农工学堂。1898年夏,经元善试图在家

乡创办“农工学堂”。拟办之事,一要兴农开荒,一要课工教艺。在当时资款有限的条件下,最切实可行就是实行课工教艺。这具有近代新型民间慈善公益事业的性质。凡来学艺的人都不收学费,只要学成之后义务担任与学习时间相等的教习就可以了。院中所教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推广中国已有的工艺,二是学习外国先进的生产技术,这样,“工艺院教成一艺,则一身一家永可温饱,况更可以技术教人,功德尤无限量”,<sup>[4]246</sup>这种授人以技能的做法,弥补了传统慈善事业“只养不教”的不足,从根本上救治了社会。所以他建议把各种各样的善堂都改为工艺院,或者在“育婴堂、恤嫠院内,各设小工艺所,俾孤儿长成,可谋生成家,孀妇得资,可贍育后嗣。”<sup>[4]246</sup>按照他的设想,农工学堂的教育对象将扩大到工农大众,教学方法从纯书本教学发展到书本教学与形象教学、实际操作相结合,并设立工作间供学生学习。这些特点表明农工学堂将努力使教育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反映了经元善教育思想的新发展。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这些设想最终未能付诸于实践。

第二,倡导“开风气、正人心”的社会公益活动。

创办“劝善看报会”,设立“选报馆”。经元善打算在家乡创办劝善看报会等慈善公益措施,已达到使人民“不出户庭可知天下”和“识时势亦明义理,除僻陋并革浇漓”,<sup>[4]268</sup>的目的,进一步扩充慈善理念,笃行善行义举。1898年,浙江余姚、上虞两县在原有继善公所等善堂的基础上,相继成立劝善看报会。该会所购书报种类繁多,包括宣传维新变法和介绍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式报刊。他希望通过读报刊杂志,不只徒摭拾新闻,聊资谈助;更要如他所言的“见我华之人被人侵削,土宇日蹙,则当思发愤自强,誓雪国耻。见泰西各国之日进文明,国富兵强,则当思振刷精神,急起直追。”<sup>[4]269</sup>在此基础上,经元善寄函乡里,建议设立上虞“选报馆”,广开民智。但由于各种原因,上虞乡人并没有实现经元善的这一愿望。而上海维新派则移花接木,把他的这一设想变成现实,于1901年创办了《选报》。

开展革除社会陋习的活动。经元善反对女子缠足,把禁缠足与禁溺婴同视为善举。在维新变法期间,他与梁启超等人发起创立不缠足会等,并担任董事。他认为缠足不仅对妇女有害无益,且对整

个中华民族危害不可低估。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经元善提出“欲强吾华赤子,固非去缠足恶习不可。”<sup>[4] 209</sup>此外,他在创办女学堂时也强调缠足是在中国沿袭了千年的陋习,规定数年后学堂将不再收缠足者入学,认为创办不缠足会与开办女学堂二者不可偏废。这些在妇女解放、社会风俗改良等方面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禁缠足成为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起点。

### 三、经元善慈善思想的影响

经元善以济世救人为职责,广施博济,开拓了近代慈善事业的新局面。随着近代社会的发展,他的慈善思想也发生了由旧趋新的重要变化,体现出若干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对促进传统慈善事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变迁也产生了深远的作用和影响。

(一)促进了民族团结,有利于爱国主义情感的增强

晚清时期,由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瓜分,中华民族处在了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经元善以慈善家的身份作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一分子,在面临国家和民族存亡的时刻萌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对内,拯救广大灾黎,促进民族团结。近代清政府疲于应付各种事变,即使有心顾及灾黎,也因庞大的军费开支和战争赔款而显得力不从心。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经元善站在民族的高度毅然担负起救治社会和人们的重大责任。他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情怀博施济众,并授他们以各种技艺,使其能自谋生存,以免再沦落为社会弱势群体。这就不仅向广大灾黎提供了生活帮助,而且情感上让他们感受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有利于民族的团结。对外,抵制外来侵略,挽救民族危亡。面对日本的入侵,经元善主张要动员全国四万万人起来共同抗战,实现全民皆兵,并且强调这四万万人要齐心和合群,这样才能达到“驱强邻以出境,完我金瓯”的目的。可见,经元善与其他爱国者一样,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并迸发出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感。这表明经元善等慈善家已意识到了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将慈善实践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紧密结合,以天下为己任,反抗外来侵略,有力地促进了民族觉醒,进一步增强了爱国主义情感。

(二)改进了传统慈善事业,有利于近代慈善公益事业的形成

经元善在继承传统慈善事业的同时,又不断地推陈出新,从而推动了其向近代慈善公益事业的嬗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改善了传统慈善事业的救济模式。传统慈善事业一向以“养”为主,模式单一,治标不治本。而经元善所创立的慈善事业则寓教于养,标本兼治。他通过开设工艺院、工农学堂等,教之以不同的谋生技艺。这就从根本上弥补了传统慈善事业“只养不教”的缺陷,标志着传统慈善事业开始向近代慈善事业转变。第二,形成了以经元善为首的慈善家群体。在传统慈善事业中,虽然也有少数绅商开展过赈灾救济等善举。但由于能力有限,赈济范围往往带有地域性,规模都较小,因而属于个别和临时的慈善活动。而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以上海协赈公所为中心,聚集了经元善,盛宣怀,谢家福等十几位江浙绅商。他们在办理义赈的过程中,既各司其职,又和衷共济,密切配合,形成了清末第一个慈善家群体。赈济的范围遍及大江南北。这能最大限度地筹集资金,使分散的各慈善机构开始携手合作,共同救助需要救助的人们。这既实现了慈善资源的优化配置,又有利于慈善事业发挥博施济众的社会功能。第三,应用了当时先进的技术手段。近代慈善事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广泛运用当时较为先进的通讯方式和交通工具。首先,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随着经元善,盛宣怀等人进入洋务企业,电报很快就被运用到近代慈善事业中,通过电报及时了解灾情,指挥救灾。其次,以经元善为首的慈善家开始利用各类报刊、杂志为他们的慈善活动服务。《申报》就对“丁戊奇荒”进行了一系列报道。通过报纸这个载体,对各地的灾情及救济情况及时的报道往往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能广泛劝说人们捐资赈灾,共襄慈善义举。这就扩大了慈善的社会影响,有利于赈款的募集。

(三)改良了旧式教育,有利于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

经元善“所创办的慈善教育不仅是近代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代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sup>[8]</sup>他主张大力兴办新式教育,有计划地培养新式人才,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尤其是女子教育事业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首先,拓宽了教育对象的范围。在旧中国,受教育往往是富家子弟的特权。而经元善创办的经正书院招生对象不拘一格,而且对刻苦的穷学生还降低学费。更重

要的是,他还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式女子学堂,反对“智男而愚妇”的封建传统,打破了旧式教育格局。梁启超也认为“通过创办女学既可以提倡男女平等,又可以改变妇女缠足陋习及不从事劳动的‘惰若游民’的旧俗”。<sup>[9]</sup>同时在启迪妇女心智,增强妇女的社会参与能力以及促进妇女自立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这彻底打破了旧式教育格局。其次,改革旧式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传统教育内容多为四书五经,而经元善创办的教育则是中西文各半,注重因材施教,以培养各种专门性人才。教学方法上,旧式教育一味地死记硬背,理论与实践完全脱离。而经元善则强调理论与实际操作、形象教学相结合,提倡“教”“学”“做”三者合一,为此设立工作间供学生学习。可见,他所从事的教育事业以其独特的教育对象,广泛的教育内容,先进的教学方法,给近代教育事业注入了新鲜血液,对近代中国教育事业尤其是女子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经元善淡泊功名利禄,乐于无私奉献,主持义赈活动达十余年。然而经元善所从事的慈善活动也有许多不足之处。首先,他在慈善教育中虽扩大了受教育的范围,但对于盲哑儿童的教育问题却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教学内容上虽中西文各半,传统文化课有所削减,但传统教育的影响仍随处可见。再者,他所从事的慈善公益活动的具体内容还比较狭窄,有待进一步丰富。他只是单纯地就慈善而论慈善,没有将慈善事业纳入到整个改良社会的系统工程中,忽略了慈善事业在当时社会上所具有地深远政治意义。总之,尽管存在或多或少的局限性,经元善所从事的慈善事业体现出了内容丰富、

范围广泛、模式新颖等特点,既是对传统慈善事业的补充和发展,也标志着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化,在中国慈善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 [参 考 文 献]

- [1] 罗彩云,陈丽华.论经元善慈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J].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 7(3): 64-67
- [2] 周军,赵德馨.长江流域的商业与金融[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255
- [3] 周秋光,曾桂林.中国慈善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4] 虞和平.经元善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 [5] 夏东元.郑观应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1111
- [6] 申报,1883-8-1
- [7] 朱英.经元善与晚清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 40(1): 88-93
- [8] 吴雁南,冯祖贻,苏中立.清末社会思潮[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 332
- [9] 廖良梅.社会慈善家群体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J].长沙大学学报,2003 17(3): 61-63
- [10]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一)[M].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89 43

[责任编辑:金晓霞]